

对殷慧芬，我也是先见识其作品，而后结识其人的。

那还是在那上个世纪的80年代，殷慧芬的小说经常出现在上海的《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上，读了她的几篇小说，

我便读出了一个文笔优雅、描写细腻、叙

事流畅、十分谙熟上海市民社会风物人情的

女作家的身影。我不是上海人，但从80年代

到90年代，我在上海生活，虽然绝

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郊外的校园里，但也免

不了有一些到市区探亲访友的机会，对上海

石库门的了解，也就有些

生趣。地展示——像极了这样复制能力

的作家，一定是对那种生活透了了缘故

。殷慧芬创造了一个石库门世界，就其作品

融入上海市民社会，并将市民社会的各色人

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情感命运艺术地呈现

于世方面，她的文学成就应该是可以与王安

忆、程乃珊等女作家相匹配的。因此，当80

年代我主編的《跨世纪文丛》出到第六辑的

时候（那已经是世纪末了），我想是应该请殷

慧芬在这里亮相的时候了，于是……



石库门

风情画



殷慧芬 著

Shikumen
Fengqinghua



对殷慧芬，我也是先见识其作品，而后结识其人的。

那还是在那上个世纪的30年代，殷慧芬的小说经常出现在上海的《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上，读了她的几篇小说，我便读出了一个文笔优雅，描写细腻，叙事流畅，十分谙熟上海市民社会风物人情的女作家的身影。我不是上海人，但从30年代到50年代，我在上海生活了10年，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郊外的校园里，但也免不了有一些到市区探亲访友的机会，对上海石库门（家的起点，我总感到殷慧芬的性多少有些石库门的影子）的复制——也就是有些作家讲的“原生态”地展示——像极了我这样复制能力的作家，一定是对那种生活熟透了缘故。

殷慧芬创造了一个石库门世界，就其作品融入上海市民社会，并将市民社会的各色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情感命运艺术地呈现于世方面，她的文学成就应该是可以与王安忆、程乃珊等女作家相匹配的。因此，当90年代我主編的《跨世纪文丛》出到第六辑的时候（那已经是世纪末了），我想是应该请殷慧芬在这里亮相的时候了，于是……



风情画



殷慧芬 著

Shikumen
Fengqinghua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库门风情画/殷慧芬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7703-4

I. 石... II. 殷...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2363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赵 亮

封面设计 杨德鸿

石库门风情画

殷慧芬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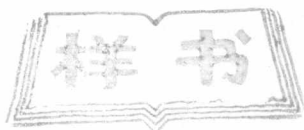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4 插页 5 字数 439,000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7703-4/I·512

定价 38.00 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序

殷慧芬和她的 石库门世界

□陈骏涛

对殷慧芬,我也是先见识其作品,而后结识其人的。

那还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殷慧芬的小说经常出现在上海的《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上,读了她的几篇小说,我便读出了一个文笔优雅、描写细腻、叙事流畅、十分谙熟上海市民社会风物人情的女作家的身影。我不是上海人,但从50年代到60年代,我在上海生活了八年半,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郊外的校园里,但也免不了有一些到市区探亲访友的机会,对上海石库门(老弄堂)人家的家居特点、生活品性多少有一些了解。我总觉得,殷慧芬笔下的石库门人家几乎就是生活中的石库门人家的复制——也就是有些评论文章讲的“原生态”地展示——像极了,有这样复制能力的作家,一定是对那种生活熟透了的缘故。殷慧芬创造了一个石库门世界,就其作品融入上海市民社会,并将市民社会的各色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情感命运艺术地呈现于世方面,她的文学成就应该是可以与王安忆、程乃姗等女作家相匹配的。因此,当90年代我主编的《跨世纪文丛》出到第六辑的时候(那已经是世纪末了),我想是应该请殷慧芬在这里亮亮相的时候了,于是,便有了殷慧芬的一本小说集《吉庆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的问世。从这以后我才开始与殷慧芬有了一些联系。

那时候殷慧芬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苦叶》、《苦屋》、《苦缘》三部曲,和刚刚发表的《汽车城》,中短篇小说集也有《欲望的舞蹈》、《纪念》、《屋檐下的河流》出版,再多一本小说集对她来说是无关大局的事,但她对加盟《跨世纪文丛》还是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殷慧芬很认真地配合我们的工作,特别把《吉庆里》、《欢乐》、《焱玉》等几部中篇近作收入其中,遂使这本中篇小说集有了新的面貌,在同辑的几本小说集中,殷慧芬的这一本是比较有分量的,我和出版社都感到很高兴。殷慧芬还推荐了一位青年记者、编辑张英跟她对话,这篇题为《倾诉和聆听》的对话录,就作为“跋”收入到她的《吉庆里》中。张英是个很敏锐、很有眼光的年轻人,对殷慧芬的作品很熟悉,文笔也好,这篇对话录写得既实在又到位,是一篇了解殷慧芬的创作思想和创作追求的好文章。



从那以后,从文到人,殷慧芬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但我们始终未曾谋面。一直到2002年秋天,我到上海参加一个性别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才见到了她。那天她好像是专程从嘉定到上海市区来的,并且热情地邀约我去嘉定她的新居做客。为了殷慧芬的热情,也为了能体味一下殷慧芬所极力推荐的她的新居的景观,会议结束以后,我和一位年轻朋友一起去了嘉定。跟喧闹的上海市区相比,我们仿佛来到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恬静、优美。殷慧芬把她的新居布置得素雅、简洁、温馨,一如她本人。连午间我们就餐的那家饭店,都显得那么安逸和雅致。只有到了这里,我才能真正体会到殷慧芬为什么不选择市区,而是选择远离市区的嘉定作为自己的居所,这与热爱写作,追求淡泊平静的殷慧芬的性格是如此之合拍!

那一年正值我33岁的大女儿刚刚离世不久,我还没有完全从对女儿之死的悲痛和思念中超拔出来,那天饭桌上不知怎么地就把话题转到了我女儿的事上,殷慧芬和她的先生楼耀福都表现出真切的关怀。后来殷慧芬还给我来过电子邮件,没有使用“节哀”一类的烂熟的用语,而是对我女儿之死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惋惜之情,并对我和我家人的悲痛表示深切的理解。在几次电话中她都真诚地邀请我和我夫人到嘉定小住一段时间,虽然我至今都未能践约,但我从这件事上也能感受到在殷慧芬身上所固有的那种悲悯之心和关爱之情。

在殷慧芬所创造的石库门世界中,这种悲悯之心和关爱之情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在她写到那些底层人物的时候,她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们,而是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种小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我笔下的人物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善恶观来臧否他们,我总是理解和尊重他们,并努力深入他们的内心寻找他们生存的理由。”她坦言,她自己就来自底层,出生在石库门老街一个很平常的上海市民家庭,自己也做过工人,“我对这个阶层的人很熟悉也很同情,现在在我的生活要比他们好,但我的感情天平始终是倾向他们的,这里有我的亲人,也有我的朋友,我觉得没有这样的感情,也就不会有我的小说。”(《倾诉和聆听——殷慧芬访谈录》,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文)

这些话很朴素也很实在,是理解殷慧芬石库门小说的一把钥匙。殷慧芬把她小说中这种对市民阶层的充盈的感情简称为“市民气息”,“正是这样的市民气息,这样的平常生活构成我人生的基础”。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上海普通市民一种情感上的深深依恋和投入,是决不可能写出像《屋檐下的河流》、《吉庆里》、《焱玉》等这样一些对石库门的风物人情一往情深的作品来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喜欢我们的弄堂,我们的房子。”——《屋檐下的河流》中的小主人公的这一段内心独白,实际上也



是作者本人的心声。在这些弄堂、这些房子里,世世代代住着上海最普通的平民,正是在他们身上,积淀着百年上海里弄文化的精粹。

殷慧芬是一个很善于编织故事的作家,她总是在小说中从容不迫、娓娓动听地叙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把读者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不会讲故事的小说家是蹩脚的小说家,但只会讲故事的小说家却不一定是高明的小说家。殷慧芬的小说之所以高出一筹和耐人寻味,就在于她从来不以编织故事为终极目标,而是以表现人类情感和人性善恶为终极目标。殷慧芬说:“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探索人类情感的。从少女到老人,从男人到女人,所有的人,他们的情感缠绕着、攀沿着岁月的大楼,装饰着我们的城市,也充盈着我的小说。”

从最初的那些短篇开始,到中期的那个“苦”恋三部曲,一直到她最后出版的长篇小说《西郊别墅》、《与陌生人跳舞》等,殷慧芬的小说都与“情”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小说,不忌讳写情欲和性欲。“苦”恋三部曲已经写得很放松了,但多少还有一点忌讳,因此她运用了一种充盈着优雅的诗意的文体,以区别于言情小说。到了90年代中期的《纪念》,这种忌讳似乎被打破了,她一开始就把故事推到了高潮:“他们先是在地毯上,后来就来到了床上……”不高明的小说家可能把这个故事写成俗而又俗的三角恋游戏,但殷慧芬却着意于梳理主人公情感的演变轨迹,探寻人类原始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在现实中最终湮灭的前因后果,纪念——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最终成了这场欲望和情感角逐的牺牲品。这场欲望和情感角逐的游戏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湮灭的?从这当中又能引发出什么让人思考的问题?一个通俗的故事当中,却包容着耐人寻味的内涵——这就是殷慧芬的高明之处。

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一些优秀小说家创作了一批被称为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小说,组成了一幅幅各自独立又彼此相通的小说世界,如汪曾祺的“高邮”系列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李锐的“吕梁山”系列小说,刘恒的“洪水峪”系列小说,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系列小说,周大新的“南阳小盆地”系列小说,陆文夫、范小青的“苏味”小说,王安忆、程乃姗的“海味”小说,方方、池莉的“汉味”小说等等……作为具有浓郁的上海地域文化风情特色的殷慧芬的石库门小说,亦当属于此列。无论是从阅读欣赏的角度,还是从研究批评的角度,这些作品都是很有价值的。

我对殷慧芬的作品,除了90年代读过的,收到《吉庆里》里的那八个中篇以外,本世纪初,我还看到过她的三部系列长篇《汽车城》、《西郊别墅》、《与陌生人跳舞》,此后,殷慧芬因罹患目疾,难以写作,我也没有看到她的新作。《汽车城》虽然获得过好几个重要的奖项,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若就我个人的喜好,



还是觉得她的写石库门底层市民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小说,文学成就要更高一些。我甚至觉得,像《屋檐下的河流》、《吉庆里》这样的作品,是可以传世的,如果后人不知道什么是老上海的石库门的话,让他们看看殷慧芬的这几篇小说,就会有一个形象而具体的了解的。现在殷慧芬的这部系列小说集即将面世了,她所创造的石库门世界也将被更多的读者所认知。这对于因视网膜脱落,几乎不能读书写作的殷慧芬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慰藉,而对于喜爱地域文化风情的文学读者来说,也将是一个喜讯。

欣闻殷慧芬的石库门小说集即将出版,我在京城特草此小文,郑重地向读者举荐,并也借以祈愿上苍降下福音,还给殷慧芬一副复明的眼睛!

2007年4月12日夜写毕于北京

目录

序 殷慧芬和她的石库门世界 陈骏涛/001

虹口轶事/001

屋檐下的河流/013

楼上楼下/063

哥哥的罗曼史/081

春之晨/097

情如春水/105

悄然而去/115

畸人/127

仇澜/147

涩重的足音/181

囚禁/203

自戕/239

锁着的抽屉/251

寂寞/257

昔日小仇人/267

焱玉/301

吉庆里/335

后记 楼耀福/373

虹口轶事





1958年的夏天，八岁的慧芬站在“一中心”的教室里，一位挽着发髻的女老师对着她轻声细语。老师讲的是一种口音浓重的普通话。慧芬一脸的困惑，只得沉默。窘迫中，她习惯地拉起衣角慢慢地咬啮起来。衣角有很多咬啮时留下的小洞。这是她长牙的时候留下的习惯。也许正是这个动作使老师下了决心。小朋友，放下来，不卫生的呀。纠正别人的错误也是老师的习惯。

慧芬走出教室的时候，等在外面的阿爸一遍遍地问：哪能了？哪能了？阿爸穿戴整齐俨然一位先生。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当初慧芬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进“一中心”读书，是因为不卫生的习惯还是因为听不懂老师的宁波普通话？总之阿爸非常失望。

“一中心”坐落在三角地菜场的右侧。弄堂里的人都知道这是虹口最好的小学，它的全称是“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慧芬家在弄堂的外围，是街面房子，站在家门口，可以看到这所小学高高的校舍。这条街上的人把“一中心”的铃声是当作时钟来看的。比如中午，下课铃声拉响的时候，在慧芬家聊天的隔壁黄家就会急着往后弄堂走，哎呀，铃响了，我回去淘米了。

黄家，就是黄家女人。50年代的时候这个弄堂里的居民相互的称呼一般是先生或者老板。女人们的称呼就简约多了，以男人的姓氏称呼，比如：黄家、杨家、张家……一个王朝的命名大概也不过如此吧？这里面似乎显示了男权的无所不在。女人们忙完家务飞短流长的时候就说，张家今天和老公打起来了。杨家的娘家是苏北窟里的。

或者跟着孩子的口吻称呼：黄家姆妈、杨家伯伯、宁波阿娘、苏州外婆、亭子间嫂嫂。也有以籍贯来称呼的：小宁波、老无锡、老山东、大广东。还有以为人性格或者外形起绰号的：老屁眼、猢猻精、洋辣子、老白蟹、老白眼、张大块头、电线木头等等。最滑稽的是12号里的张革履，据说是因为他老是衣装笔挺，派头很大的样子。

阿爸的绰号是“小铜匠”。这是他的职业。就像有人叫张木匠、李剃头、穆裁缝。从阿爸的绰号可以分析，他来到这条街上的时候是十分年轻的。

这些称呼是知根知底的，没有隔阂的，你的来头大家都是一清二楚的。假如弄堂里来一个陌生人，跑到张家楼下喊一声老张，这个陌生人就大抵是单位里的同事，是



有些距离的。弄堂里的人不会这样见外的。

有些人的绰号竟然还传宗接代了,比如小屁眼、小猢猻、小辣子、小白蟹、小白眼。

慧芬的绰号是“排骨精”,这是因为她非常瘦弱的原因。瘦弱有时候会给人一种为人活络的错觉,阿爸就是这样以为的。

那年慧芬成为峨嵋路小学的学生。这个小学在三角地菜场的楼上。这是一座新办的小学。新办的小学是初出茅庐没有底子的。上海弄堂里的人是很相信老底子的。“一中心”的老底子是一所教会学校,一百多年前三角地还是一片农田的时候,它就已经屹立在这里了。阿爸一心要把慧芬送进“一中心”,阿爸是要面子的人。慧芬又何尝不想呢?特别是眼看楼上二房东杨先生的女儿小秀进了“一中心”,平时慧芬和小秀一直是要别苗头的,所以慧芬心里很难过。

慧芬去三角地上学的时候,看到穿着橡皮衣的工人用巨大的铁钩牵着冷冻的猪肉,在菜场二楼走廊里穿梭,和她擦肩而过。天光暗淡的走廊里,散发着肉类特有的腥味。

很多年以后慧芬成了一个文字工作者,她去卢湾区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老人说三角地呀,上海最大的菜场了!1960年的时候,我天天乘头班电车去买菜的呀,三角地的货色多呀,小人要吃呀。那个天光暗淡的早晨顿时重现在慧芬的眼前,连同肉类的腥味。慧芬有一点点感慨。

有很长的时间,慧芬不要同学到自己家里来。慧芬家的屋檐下挂着一个很大很大的钥匙,是用白铁皮敲出来的,钥匙的牙齿高低错落,非常逼真。这是铜匠铺子的招牌。过路人远远地看见了就知道这里是铜匠铺。阿爸是一名无锡铜匠。看着阿爸早起晚睡的,卸排门板,上排门板,慧芬就很羡慕楼上的小秀。小秀阿爸杨先生在外滩海关的写字间上班,有时候还喜欢甩一根司的克(手杖)在小街上兜兜商铺,很有风度的样子。慧芬自己的阿爸老是蹲着劳作,脚上已经是青筋爆出了。慧芬想,阿爸当初发了洋财就好了,可以住在洋房里,不要在峨嵋路这样的小马路上挂一个大大的钥匙了。三角地附近的塘沽路、昆山路上有许多红墙的小洋房。就在自己家的斜对面,有一个类似广场的弄堂,里面也都是式样别致的小洋房。弄堂里的小姑娘,夏夜坐在上街沿乘风凉,听老人讲老底子的故事,想的就是将来要住到洋房里去。

慧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想做梦的话,还可以做。阿爸已经不能做梦了。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阿爸曾经做的梦是发财梦。



1846年美国传教士在“一中心”的地皮上造学校的时候,看中的是虹口这块空旷的处女地。三角地可以说是虹口成市的最早的雏形。形成后的虹口租界并没有吸引来大量的洋商,倒是无数的江浙两省、广东省、山东省的移民顺着苏州河源源不断蜂拥而入,其中就有大批的无锡铜匠和铁匠。当然也有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和统治严密的中国官方社会相比,虹口租界无疑是一个自由港。1931年,十八岁的阿爸一身长衫追随着早先的无锡铜匠来到上海虹口。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是个青年学生。其实他只是一个家有几分薄田的农民的儿子。他不是来追随革命。他满脑子想的是来上海滩发洋财。

那天阿爸在“一中心”外面衣装笔挺的样子,令慧芬觉得阿爸像个坐写字间的先生。慧芬就是在这时候强烈地意识到阿爸要面子的性格。听姆妈说租界时期阿爸出门在外、办事见客必定是长衫、皮鞋,风度翩翩。阿爸的长衫曾经带给他很大的麻烦。日本人统治时期,阿爸过年回无锡乡下探亲,身着长衫、手提皮箱,很有一点衣锦回乡的味道。谁知走近村口的时候,碰到邻村的还乡团,团丁看阿爸一身斯文,不像当地人,怀疑他是上海来的共产党,竟扣住不放,后来经村里的熟人“和尚”出面担保,方才脱身。为此破费了好几块大洋。“和尚”是阿爸的同乡,秃顶,喜欢在市面上混混,性格直率。听姆妈一说,慧芬恍然大悟。她见过“和尚”,是个说话大声身子肥硕的老头,经常到上海找阿爸喝酒的。酒水糊涂。姆妈虽然十分嫌弃,却也无奈。原来是阿爸的救命恩人。

无锡铜匠在老上海是很有名气的手工艺人。最早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人称外国铜匠,就是无锡铜匠转化来的,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机器工人。阿爸却拒绝成为一名产业工人。这有悖于他发洋财的梦想。他还有非常男人的理由:“厂里不自由。”

租界时期的虹口是小业主的天堂。虹口市面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江浙老板,广东小贩。”那些江浙两地的小老板们在虹口发了财,其中的佼佼者就向闸北、杨浦发展,进入大工业领域。他们带走了大批同乡。这些成功者的榜样显然刺激了阿爸。阿爸一度收了个叫根宝的学生意(学徒),让他跟家里女人做饭洗衣抱孩子。还让根宝称呼自己——老板,蹒跚的女儿——小姐(慧芬的大姐)。这事发生在慧芬出生之前。慧芬是在阁楼的小皮箱里发现这个秘密的。皮箱的衬袋里有一张阿爸和根宝父亲的契约。契约上写着根宝在三年学生意期间: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天灾人祸,生死由命。这时候正是上海滑稽戏“三毛学生意”走红的时候。三毛学生意的悲惨遭遇人人皆知。慧芬从此看阿爸就有了一种异样的目光。其实阿爸的老板梦不到三年就断了。根宝改换门庭另谋高就,炒了阿爸的鱿鱼。



说起来,阿爸的一生还是有过不少机会的。

租界时期,这里便是日本侨民的聚居地。日伪时期,日本侨民更是急速膨胀,附近塘沽路上的日本人俱乐部夜夜莺歌燕舞,车水马龙。有一天日本人不知怎么打听到了峨嵋路小铜匠,客客气气地把阿爸请到了俱乐部,说是请他开锁。来人非常诡秘地从一楼的厨房后面拐进楼梯,把阿爸引进三楼一间豪华的和式套房里,房间中央立着只半人多高的保险箱。来人叽里咕噜地比划了一阵,不用多说,阿爸就明白了是要他打开保险箱。这里做做小生意的人大多都会几句洋泾浜日语。

来人吩咐完毕就退了出去。阿爸稍稍安定心思,就对着保险箱捣鼓起来。琢磨了老半天保险箱终于有了动静。阿爸不假思索地拉开门。没想到这一拉,里面成捆成捆的美元和黄金首饰竟哗啦啦地滑落了一地,把阿爸吓得心怦怦乱跳。此时此刻四周空无一人,阿爸只要伸手,发财的梦想立时就能实现(慧芬猜想阿爸思想斗争了一阵子)。但是阿爸没有。阿爸后来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人穷志不短。慧芬却猜想阿爸是不敢。因为当时日本人在虹口实行非常酷烈的统治,小偷一经抓获立时枪毙。

只是日本人自己也不清楚保险箱里的秘密吧,要不怎么会把阿爸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呢?假如日本人知道阿爸发现了保险箱的巨大财富,很难说他们不会杀人灭口。阿爸思索良久,弯腰拾起地上的金钱,一文不少地放回保险箱,恢复原样,重新锁上了保险箱。

“哈意,这只保险箱特别的,本事没有的。”阿爸不动声色地对日本人如是说。他两手空空灰溜溜地离开了日本人俱乐部。这是比放弃发财梦更痛苦的抉择。手工艺人最大的骄傲和光荣就是本事,此时阿爸却违心地说自己“本事没有的”,这要有一点自戕的勇气。一名英雄的两难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小铜匠开锁的本事在当时三角地一带可谓闻名遐迩。这是阿爸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现在他自己把自己打败了。他后来很长时间不再上门替人开锁。“东洋人,日本赤佬!”阿爸耿耿于怀,愤怒的时候会这么嘀咕一句。慧芬最小的弟弟阿七头第一次听阿爸说保险箱的故事,就责备阿爸说你为什么不拿一点钞票呢?现在用用,日脚就好过了。和阿爸相比,阿七头已经是人穷志短了。慧芬这样的话是讲不出来的,尽管她不是一点想法也没有。50年代初出生的人大多都有一点虚伪。他们会朝着期盼的目标努力,但是他们不会流露。

小时候的慧芬经常走过塘沽路。附近有免收门票的昆山公园,是弄堂孩子疯的去处。她还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住在塘沽路,就在原日本俱乐部旁边的民居里。慧芬本来对这一切是熟视无睹的,知道了阿爸的故事后,走过这栋古典主义的西式建筑,就要抬头看看。它挂着“浦江电表厂”的招牌,昔日泊满豪华小车的门口,如今堆



着一摞一摞的包装箱。大楼中间顶部，白色大理石花饰镶嵌在高高的半圆拱窗上，散发出一种极端的华美和邪气，还有依稀的狰狞，和三角地一带平和的居家气息显得格格不入。慧芬会想，三楼的哪一个窗口曾经发生过有惊无险的一幕呢？假如当初阿爸在那只神秘的保险箱里伸了手，他们一家生活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上海弄堂小姑娘都是比较实际的也是富于想象的，十里洋场一夜暴富的故事距离她们并不遥远。

慧芬后来初恋的时候喜欢在这里和男朋友碰头。夜晚，那深长的美丽拱券窗射出隐隐的灯光，映现出往日的神秘。慧芬就和男朋友说阿爸的故事。

五年以后，发洋财的机会又一次向阿爸招手。阿爸时代发财的机会似乎比慧芬的时代要多得多。

那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居住在三角地附近的日本侨民开始大批撤离遣返。慧芬家的这条街，日式商铺和中国商铺犬牙交错，街对面弄堂的一排小洋楼里居住的就全部是日本侨民。曾经一度，不少日本人觉得这里的生活和内地（日本本土）没有什么两样。现在他们要痛苦地撤离这块乐土了。由于仓促，他们只得把一些生活用品廉价拍卖。在当时的气氛下，他们自己不敢公然出面，还有一些日本商人也急于把自己的货物出手，弄堂里就有不少人乘机当掮客倒卖、收购日货，形成了一个很热闹的自由集市。有很多日本生活用品就这样散落在弄堂人家的角角落落。慧芬家里就有一只小小的奶锅，她和兄弟姐妹，还有她们的孩子都喝过这只奶锅热的牛奶。它至今还躺在小弟弟家的厨房里。半个多世纪了，它的胶木手柄还是那么坚固、挺拔。一只精致的藤编小桌，矮矮的，完全是东洋造型，慧芬在上面做功课的时候，膝盖常常是弯曲的，后来阿爸索性做了木垫子，坐着就舒服多了。姆妈习惯用的饭碗也是东洋货，它的造型比一般的中国饭碗要深。年轻时姆妈饭量很大。姆妈说这样的东洋碗当时买了十只，几十年来砸碎了、遗落了，最后就剩这一只了，用到死也差不多了。很奇怪的，1996年母亲过世的时候，这只饭碗还在，后来再有人想起这只饭碗，就怎么也找不到它了，大姐说见鬼了。在1960年的饥荒里，每当姆妈捧起这只饭碗，孩子们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它意味着姆妈是这个家庭里最重要的人物。

阿爸在1946年倒卖日货的浪潮中，成为一名临时掮客。当时市面混乱，不少人顺手牵羊，阿爸前脚从对面日本绒线行背了一麻袋绒线放在后门口，上去一趟，再下来，后脚一袋绒线已经不翼而飞了。乱世，乱世呀。阿爸捶首顿足不已。在吴淞路一家日本写真馆老板的怂恿下，阿爸收购了他一只德国蔡斯照相机。据阿爸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庞然大物，镜头清晰，好得一塌糊涂。阿爸没舍得拿到集市上去。十年



后父亲把这只照相机变卖了一笔现钱，它使刚出生的阿七头喝上了新鲜的牛奶。但是阿爸始终没有忘怀那只蔡斯照相机。

慧芬在阿爸的唠叨中知道了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都是有牌子的。慧芬后来学会购物，第一句话总是问，什么牌子的？国门没有开放的时候，慧芬对那时候的品牌是如数家珍的，比如，大衣要买朋街的，皮鞋要买蓝棠的，面油要买友谊的，牙膏要买白玉的，罐头要买梅林的，大衣柜要买解放的，汗衫要买鹅牌的，洗头膏要买海鸥的，脚踏车要买永久的，手表要买上海牌的……这是阿爸熏陶的结果。后来的慧芬就落伍了。

慧芬猜想阿爸倒卖日货的时候发了一笔小小的横财。好几年以后，慧芬听见妈妈在对阿爸悄悄嘀咕说，家里的老底都吃光了，日本人在的辰光买的金戒指也倒给黄牛了，过年哪能办？这个时候阿爸已经进了国家工厂，再也没有机会发洋财了。妈妈无钱开伙仓，生气的时候就骂自己的孩子是讨债鬼。“讨债鬼呀！吃饭像抢羹（丧）饭，吃得肚皮青筋起，不管爷娘死不死！”家里开饭的时候，锅里的粥要一碗一碗盛吧？还没轮到妈妈，前头的已经在喊要添了。1960年，最小的阿七头也已经四岁了。一个个都是长身体的辰光呀！

阿爸还有过一次发达的机会。那是他的一个无锡同乡，1941年的时候去参加新四军，临走前来跟阿爸借盘缠，心血来潮要拉阿爸一起走。快三十岁的阿爸想了半个时辰，就回头（回绝）了同乡。这时候的阿爸正是新婚，快三十岁的男人好不容易讨了老婆，正是热身的时候，哪里肯离开床头？慧芬猜想这个同乡当初也是随口说说，没有诚意的。后来这个同乡革命成功，回上海成了一家机关的领导，在外滩的大楼里上班，他把阿爸请去做客。阿爸后来一次次地回忆，总是说，作孽呀，好好的房间，席梦思反着困（睡），抽水马桶成了蹲坑。阿爸是有一点反动的。

慧芬开始看外国“闲书”的时候就变得和阿爸、和家里的人不调和了。这是“闲书”对她的毒害。“闲书”是阿爸的说法。凡是教科书以外的小说书，尤其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书，阿爸都认为是“闲书”，一概划入禁区，不许看。这是一个中国父亲的专制。社会学家在这样的专制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可以挖掘。这时的阿爸已经安于现状，他早已放弃了他的发财梦，成了一家国营工厂的老师傅了。

那些外国“闲书”大多是隔壁汰衣裳店里的营业员美英借给她的。慧芬至今都不明白成年的美英为什么会借书给一个小学女生？而且慧芬对美英表现出一种隐隐的疏远。慧芬记得美英叽叽喳喳的快活样子，阿爸说她是十三点。尤其是美英和拐弯角摆摊头的小皮匠搭上了，闹得都不回家了，阿爸就更看不起美英了。美英因为处在



一个姑娘最微妙的阶段，就老是找一些充满悲欢离合的“闲书”看。比如，《父与子》、《初恋》、《安娜·卡列尼娜》、《美国悲剧》、《奇婚记》、《傲慢与偏见》、《简爱》、《基度山恩仇记》……小学女生慧芬看这些书显然是过早了。她无法抵御和分辨精彩的虚构世界。当她偶然间听到姆妈和阿爸在发愁说，过年哪能办？她在失望中有一些怨艾阿爸。阿爸既没有发财也没有参加革命，这使慧芬感到非常遗憾。

屋檐下挂着的大钥匙早已经取下来了。

是1960年的时候吧？仿佛是一夜之间，这条商铺林立的峨嵋路成了普通的居民街。国家调整商业网点，小商铺关的关、并的并，留下的只有日常生活必需的老虎灶、剃头店、煤球店和烟纸店了。阿爸的铜匠铺也难逃此关。阿爸的抽屉里，还留着一大把用粗铅丝弯的开锁工具。在慧芬看来犹如一把乱头发，但对阿爸来说却是宝贝家什，私自留下放在家里也是为了了一种心情。

店铺改成了家用的客堂。看着新砌的白墙和红窗，慧芬感觉到一种新生活的气息。从这以后慧芬家里就对同学开放了，峨嵋路小学三年级的学习小组三天两头开在慧芬家里。

阿爸却是无奈的。他终于完成了无锡铜匠向外国铜匠的转变。这是手工业文明向大工业文明的投降，向始终没有实现的发财梦想告别。只是这种转变来得太迟。“文革”时期表格满天飞，比如新沪中学初三(4)班就有很多战斗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革命到底司令部”……三两个同学就可以拉大旗作虎皮了。任何一个战斗组都有自己的申请表格，表格上必定有“家庭成分”这一栏，且注明必须是解放前的职业。中学生慧芬对着表格犹豫的时候，再一次对阿爸生出怨艾。

阿爸的形象是定格在一张大照片上的。

这张照片挂在后房间里。照片上的阿爸身着长衫，发型对开，手持折扇，双目明亮，脸庞俊朗，真可以说是长身玉立，像唱戏人一样。

很早的时候，假如弄堂里的小姑娘认为某某长得好看，就说他(她)像唱戏人。

1949年以前的阿爸最喜欢的服装就是长衫。可惜慧芬没有机会看到。生活中的阿爸夏天是打赤膊的，冬天是一件陈旧的列宁装棉袄，他唯一的一件黑色呢制大衣，经姆妈“改改”后，成了慧芬16岁时的纪念。那年她发育成人，姆妈认为到了讲究体面的时候了。这件呢制服的衣料质地细腻，毛感柔和，阿爸说是英国货，也是日本人撤离的时候留下的。一件大衣可是非同寻常，按照这个时代上海人的观念，一件考究的呢大衣是以后一辈子的家当了。上海弄堂小姑娘结婚要一件呢大衣，是男方一笔非常重要的预算，否则是不过门的。